

不平等的起跑线“搞死”了孩子

朱述古

被网友称作“最牛愤青教授”的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近日做客某高校论坛时,痛批教育“低龄化趋势”。他表示,“我痛心呀!中国的孩子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搞死在起跑线上”。针对中国孩子在国际奥林匹克赛里屡获佳绩而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问题,郑强在身后大屏幕上打出“强哥语录”：“这是因为在做小孩时没有玩,不允许玩,被别人玩。”(《武汉晚报》6月2日)

“最牛愤青教授”的痛心是有道理的。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太重,升学教育竞争过于激烈,影响身心健康,扼杀创造力,已成

社会共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进行深刻反思。不过我以为,要看到起跑线“搞死”中国孩子的危险,更要看到,正是由于起跑线本身的不平等,家长和学校才甘愿冒着孩子被“搞死”的风险,给他们稚嫩的肩膀压上沉重的课业负担。

理当承认,“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却并不符合教育规律。家长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轻松快乐的童年,能在无忧无虑中茁壮成长。但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让家长进退两难,如果一步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人生的起跑线不是一次性设定的。对

中小學生而言,每一所学校都是一道新的起跑线。但放在整个学校布局中就会发现,同样是政府开办的中小学,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学校的师资水平、设施设备、升学率以及社会声誉,差别十分巨大。这种畸形布局对孩子的直接影响,就是有有的站在超前的起跑线上,有的站在落后的起跑线上。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升学率会令薄弱学校相形见绌,也会对家长和孩子形成强大诱惑。

诚然,教育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教育的主导作用,也取决于学生的主观努力。重点学校毕业的学生并非全是英才,薄弱

学校中也会飞出金凤凰,但就整体而言,良好的办学条件无疑缩短了学生走向成功的距离。但越是重点的学校,门槛也就越高,进入的难度也就越大。更何况,重点学校的在读学生要在下一阶段继续就读于重点学校,当然不敢稍有懈怠。孩子当然可以玩,当然可以保持天真烂漫的天性,但进不了重点学校,前程就将布满阴影。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没有理由责怪那些硬逼着孩子从小背唐诗、弹钢琴、做作业到深夜的家长。家长和孩子一样,同样是受害者。

日前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显示,10年来,我国中小学生学习时间持续减少,学习日

近八成致睡眠不足,假期近七成致睡眠不足,读书求学已成折磨。教育专家对于教育的愿景,居然沦为为“今天睡得好,明天不跳楼”。试想,如果每一个中小學生都能享受到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大致均等的教育,他们犯得着为“起跑线”疲于奔命吗?

“重点学校像欧洲,薄弱学校像非洲”的学校布局,加剧了起跑线争夺战的白热化。孩子一进校园,就无可逃避地进入一种无比残酷,但并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步伐,下决心消除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在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上的差距,才能真正解放孩子,还孩子以自由全面发展的成长空间。

冰点时评

怀疑批判并不意味着别有用心

杨于泽

最近由于长江中下游旱情严重,有人怀疑上了三峡工程,媒体对专家意见的报道多起来。其中倾向性的专家观点,是断定三峡工程与大旱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千旱古已有之。对于那些怀疑的声音,他们认为没有任何根据,甚至是别有用心。他们的心情,似乎是急于制止人们的“无端怀疑”。

撇开具三峡之争不谈,我感兴趣的是,拒绝怀疑,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一旦有怀疑,是不是一定就是别有用心?在科技领域,怀疑,不过是提出问题,提出研究课题。基于事实开展科学研究,用事实说话,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中国科协大会上强调,在科技领域,要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按理,专家应当乐见学术争鸣,视持异见人士为学术诤友。但事实上,有些专家一听到怀疑的声音就坐不住,视之为异己和敌人,必欲鸣鼓而击之,但求从此耳根清静。

这可能跟某些媒体策略有关,媒体在碰到某些争议问题时,往往急于拿出权威结论。其实,这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因为可靠结论可能暂时没有。他们找来的专家,多是当年参与论证、主持设计的人,其观点当然有其倾向性,这本身就连违反了传播的平衡原则。这些专家未必着手什么跟踪性研究,其观点、论据和方法很可能还是当年的旧货,所谓权威观点无非是老调重弹。

这类专家及其“科学观点”,严格说来,最缺的就是科学精神。记得2004年丁肇中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有人问了他几个问题:“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丁肇中连说,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往往沉不住气,记者电话打来,专家立马就是一通结论,那架势似乎科学研究已经终结了。最近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有位专家,谈三峡工程,涉及水利、气候、地质、生态诸领域,俨然是“全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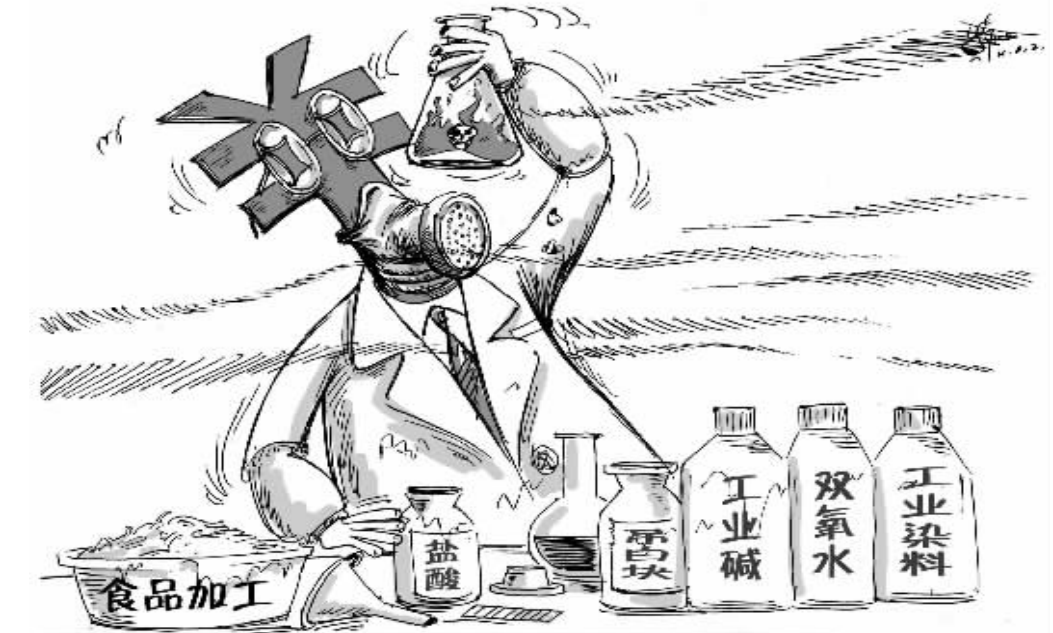
专家缺乏科学精神,可能与我国的教育弊端有关。科学,在西方历史上长期隶属于哲学,哲学是科学的源头,而哲学的本质是智慧,这意味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基本的哲学智慧,其思维往往是片面的、线性的、武断的。食品添加剂可能对人体不直接构成危害,但其代谢物可能有;三峡工程与干旱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三峡工程会不会导致生态变化,而生态导致环境变化,最后环境变化再导致干旱呢?这种非线性联系,他们似乎很少想到。

现在总有人提议对公众进行科普,其实对专家进行科学精神的普及,也非常必要而迫切。专家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需要辩证思维,需要哲学智慧。那种以为真理在握、科学终结的专家,其实是无知的人。专家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当专家超过专业分界,就不再是专家。这样的专家,似乎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们又不是。其专家身份实际意义不大。

彭健

这两天,“紫荆侠”成为香港社会的焦点话题。这位戴着面罩、衣着性感、夜入笼屋向穷人发钱派粮的女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有关“紫荆侠”的最新消息是,她于近日突然探访位于佐敦的一间“食物银行”(为经济有困难人士提供暂时性膳食支援的机构),除带来大量即食面外,更向在场约60名长者每人送上100港元。“食物银行”负责人惊叹:“她能独自托起大号饭煲,而这个煮60人饭量的电饭煲,重约50磅(约45斤),平时需要两位工作人员抬。做侠士的人,果然气力非凡!”据在场人士回忆,“紫荆侠”身高在1.65米~1.7米之间,说话的声音



钻研

沈阳市沈北新区一黑作坊工人,努力钻研有毒食品加工,以此“劳动致富”。《北京晨报》6月2日

漫画:徐简

养老的钱从哪儿来

谢昱航

国务院决定从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今年试点范围覆盖全国60%的地区,明年覆盖全国。年满16周岁,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可在户籍地自愿参保;年满60岁、符合条件的城镇居民,不用缴费可按月领取养老金。(《中国青年报》6月2日)

目前我国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有国家公务员退休制度、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少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出,意味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当然是一件惠民大好事。

但是,听到这一好消息的同时,也有让人“扫兴”的新闻传出:上海养老金支付压力一直在加大,每年百亿元的养老金账户的亏空很难填补。事实上,养老账户亏空,不只是上海的事,去年中国社科院的专家透露,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个人账

户“空账”已达1.3万亿元。

在养老资金已现亏空的前提下,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养老金面临的压力就更大。而且,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退休时的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很低,比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的规定低了15%。考虑到养老水平以后提高的需要,养老金面临的压力更添一层。如何为养老账户“补血”,扩大养老资金的来源,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诚如专家所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产出,是解决养老资金的关键,也是根本。但是,这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受很多因素制约,有时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提高养老金单位与个人缴存比例,几乎是一种共识,养老保险的缴费率也在不断增加,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已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坦言,在缴费上为养老金“开源”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

养老资金的财源还有没有?在哪里?

国企红利是一个突破口。2010年,所有央企利润总额达到11315亿元,但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仅有数百亿元。央企的所有制性质,其享受着国家资源、资金等方面独特的优惠政策,决定了其理应为全民福利服务,对于社保等民生方面,完全可以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整个“十一五”期间,央企通过国有股减持转入社保基金的资金只有589亿元,与其巨大利润总额比,微不足道。虽然央企利润的支出也有说法,比如用于企业的再生产和做大做强等,但种种迹象表明,央企是存在很大的贡献空间。将那些“天价灯”、“天价酒”、超配公车以及高工资、高福利挤挤水分,将会节约一大笔开支。

当然,除了开源,多种迹象也提醒我们,养老资金的妥善管理不应被忽视。不能否认,养老资金的亏空,与养老金管理失责有一定关系。据统计,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有10亿元社保基金因为被挪用、挤占而没有回收。近几年内,浙江金华社保案中,数亿元社保金被挪用;上海社保基金案中,32亿元的社保基金被违规拆借;山西太原社保案中,涉案金额也近1.8亿元……各种贪腐行为,让社保资金造成巨大损失。

父母收入影响子女未来

域外之音

王冲

父母收入增加10%,其子女的收入就会提高4.5%——父母收入高对一个人的前途有帮助,而父母如果在国有单位工作,则帮助会更大。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报道,引用了北京交通大学张应强(音)和丹麦奥胡斯大学托尔·埃里克松2010年的论文。论文根据1989年至2006年涵盖9个省份数千个家庭的调查,对其后代的生活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后代生活状况的差距越来越大。研究人员估计,结果的不平等,有63%是机会不平等所致。

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有蔓延之势,富裕阶层甚至关起门来,不和穷人交往。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PI.CN是一家面向中国城市富裕阶层、仅接受受邀请人的社交网站,已经吸引了120万会员。该网站的成功,似乎源自“阶级社会”的理念。

PI.CN的潜在用户,月收入至少要达到8000元人民币,奢侈品市场研究人员称,这是上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门槛。不过在普通会员之上,还有银牌、金牌和铂金会

员。这家公司的CEO王宇表示,铂金用户“基本上都是超级富豪”。在其他国家,程度较高的排他性往往与年龄相关,但PI.CN表明,中国的情况与此相反。王宇说:“金牌会员往往比铂金会员年龄更大,因为后者经常属于“富二代”。”

富人们享受品质生活之时,穷人们可能在为基本的福利保障发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就医疗问题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但医疗服务支出,不到全国总支出的20%。在农村,重病患者的家属需要四处举债才能保证治疗和住院费用。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列入全球第四大医疗卫生不平等国家。为了减缓社会不平等,中国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做出了努力,2005年,中国开始实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时至今日,农民及儿童、没有退休金的老人和失业人员都已被纳入医保体系。另外,将从2011年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今年试点范围覆盖全国60%的地区,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作为世界上对待“老外”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社保体系也没有忘记外国人。5月30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

保中心副主任徐延君说,今年年内,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有望加入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

对此,埃菲社进行了报道。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将于今年7月起正式实施。这项法律规定了所有劳动人员都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五大险种。以前,许多生活和在中国的外国人,只能享受到“有限的”保险。

埃菲社也看到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只覆盖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一些私营企业只能给员工提供有限的基本医疗或生育保险。有限的社会保险覆盖率,让医疗支出成为许多家庭的重大支出。

不过,对新的《社会保险法》有关外国人上保险的规定,外企并不领情。6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新法规让外企付出更多成本。按照新法规要求,雇佣外国人的公司,需要每月为每个员工缴纳各种保险费用4324.56元,而每个外籍员工每个月也要多缴纳税1285.68元。报道说,中国东盟商会已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部提出要求,希望这份保险对外国人是可选项,而不是必选。

变现实,在中国侠文化里,“侠”也基本上是从“家”与“国”出走的人。因为“侠”之是为戳痛了某些社会痼疾,代表了某种社会情绪,因此成为人们心中浪漫而孤独的偶像符号。导演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李慕白”。又或者,人心中都有一个“紫荆侠”。

众所周知,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当健全,像“食物银行”这样的救助机构,许多内地人士恐怕此前闻所未闻。但即便如此,依然有“紫荆侠”这样的市民提醒着香港社会,政府和社会在许多方面做得还不够好。香港各界也容忍和呼应着这样颇具想象力的提提,并借此反思社会运作机制的缺失和不足。

而在香港之外的其他地方,虽然没有“紫荆侠”的出现,但却不代表全民所期待的价值都一一得以实现,这背后甚至隐藏着某种无奈和漠然。从这个意义上说,“紫荆侠”所触动的,也绝不仅仅只是香港市民的心。

根本没有“敲诈政府罪”

杨清

两年前,因被指控组织村民通过假上访给政府施压而“多领”60余万元补偿款,河北张家口贾文等7村民被诉“敲诈勒索政府”。日前,贾文等收到崇礼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新京报》6月2日)

“敲诈勒索罪”并非河北崇礼的独创,2008年至2009年间,在河北沧州,至少有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而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2010年,山西农民马继文也因上访而被判“敲诈勒索罪”,获刑3年。

蹊跷的是,在诸多“敲诈勒索政府”案中,当初有关部门高调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审判,但最后往往低调地处理、放人。2009年11月,沧州南皮县的两起“敲诈勒索”案在河北省检察院关注后撤销;山西农民马继文在被判刑一个多月后,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让妻子和女儿十分意外;而张家口市崇礼县这起“敲诈勒索政府案”,在公诉一年多后,检方突然作出绝对不起诉,同样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怪事并不奇怪。“敲诈勒索罪”本身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总是要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威胁,政府机关不是自然

人,当然不存在“生命、身体自由”之类;政府机关由公民让渡权利而组建,天然地要接受公民的批评与监督,损害其名譽也无从谈起。有关部门给上访公民定“敲诈勒索罪”时,本来就有违公理,经媒体广泛报道,舆论猛烈监督,被高层领导知晓,当然也就只好偷偷地放人、静悄悄地撤案以息事宁人。

遗憾的是,上述几起放人、撤案、不起诉的“敲诈勒索”案中,没有一起是被法院明确宣告无罪的。有的判处有罪后偷偷地放人,有的判处有罪后撤案,有的提起公诉后撤回不作不起诉,法院从来没有光明正大地宣判,所谓“敲诈勒索罪”根本不构成犯罪,公安侦查、检察院逮捕是错误的。上述几起案件之所以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处理结果,只是根据特殊情况作出的特殊处理。

这就意味着,倘若下次再遇到上访公民所谓“敲诈勒索政府”的行为,公安机关照样可以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照样可以提起公诉,法院照样可以判处有罪。如果这些“敲诈勒索”案没有得到媒体广泛关注,舆论没有进行监督,没有引发高层领导的关注,那今后的上访公民恐怕连放人、撤案和不起诉这样的幸运都可能错过。

所以,河北崇礼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作出绝对不起诉,只具个案意义。我希望这起案件不只是由检察机关作出绝对不起诉,而是由法院直接宣告无罪,并将其作为典型案例通报全国,以便给此后的类似案件作判例。

退休副局长还能坐收多少人脉红利

王学进

南京江宁区一退休副局长张必河,利用周里村建设新农村之机,以生态农业开发为名占地400亩,补偿价每亩每年400多元,合同期限5年,最后多数土地被撂荒,张必河建了一座“元湖农庄”,还陆续在园区内盖起别墅等违建。元湖自然村原村长朱启贵肯定地说,这是个没规划、没建设许可的违建,甚至连当年的土地流转也没得到相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扬子晚报》6月2日)

按400元一亩的年均补偿费算,张付出的土地流转费也就16万元,个人承担得起,但在400亩土地上建起一座农庄,没有几千万肯定拿不下来。张必河哪来这么多钱?他只是区区一介江宁区的副局长,居然在没有规划、没有建设许可的情况下,私建了“元湖农庄”,事到如今,江宁区国土局执法监察大队也只是拆除了违建别墅,对农庄的主体建筑仍无可奈何。

土豆网的信息显示,张就任过江宁区人事局、交通局副局长。这两个实权局办,张必河之所以那么牛,估计和在任时建立起的广泛人脉网络不无关系。

这些年,有关退休官员坐收人脉红利的消息层出不穷。退休高官王亚忱案就是典型。王在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任上,任人唯亲,安插亲信,退休后依然能

呼风唤雨,直至案发被捕。上海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原副局长殷开平,退休后担任上海市土地协会会长,仍疯狂敛财,仅2005年一年向一人就索贿、受贿2800万元。

此类现象必须得到遏制,除了严格执行《公务员法》和中纪委2001年下发的关于公务员和官员退休3年内“两不准”的规定外,还须学习香港经验。从香港特区政府前地产和房屋事务高官梁展文,退休一年多后拿高薪“再就业”,17天后在民众质疑声中被解聘的消息中,我概括出几点:

其一,建立官员退休或辞职后去向及从业情况申报公示制度。梁展文“再就业”17天就被解聘,原因在于香港有这样的制度,凡是涉及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去向,无论现任或已退休,都要在指定期限内向公务员事务局做出交代。

其二,调查公众对官员退休去向的知情权。在调查梁案过程中,调查组曾出炉5个小时后,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会见记者,就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及质疑,再次向市民解释和道歉。两相比较,我们对张必河的情况又知道多少?

其三,建立和完善官员退休“再就业”审批管理制度。香港官员退休“再就业”必须向特区公务员事务局提出申请,审批后方可“再就业”。内地有必要学习此制度,并在实践中推进和完善。

国土局的门就这么难进?

胡印斌

想进温州市国土局吗?先得过了保安这一关。守候在国土局门口的这群彪悍保安,极尽盘问、刁难之能事,轻则三言两语打发你走人,重则张口“老子”,闭口“去你妈的”,推推搡搡也是家常便饭。据温州市保安总公司负责人披露,大批保安是应温州市国土局要求入住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前来上访的群众。(《法制日报》6月2日)

官员们不是总闭口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吗?既为“公仆”,又何以总对群众如此抵触?温州市国土局森严的门禁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服务意识、执政作风乃至民本理念的极度匮乏。

政府机关不是政府官员安心静养的乐园,也不是戒备森严的禁地,更不是高高在上的衙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由公共财政支撑、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而已。官员因为需要经常办公、理政,所以常驻于此,但这只是为了公务便利,并不能抹杀机关的公共属性。设置一些门槛,是为了公共安全而非将群众拒之门外。

这样简单的道理,相信温州市国土局不会不明白。既然明白,为什么还要雇佣

大批保安以对付上门的群众?报道披露,从1999年至2009年,温州市有近10万亩土地已经“农转用”,却迟迟供不出来,10万亩土地居然晒了10年太阳。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开发区5万亩土地的GDP为115亿元。按此标准计算,10万亩土地晒太阳意味着多少损失?这可以说是哪一种典型的行政不作为,甚至是渎职罪。

10万亩土地晒了10年太阳:一方面,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原本人多地少的温州农地更加紧张;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尽管当地相关部门仍在纠缠责任的认定,但作为主管土地的国土局,责无旁贷。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温州市国土局信访数量一直居于全市前列的原因之一。群众为什么去找国土局反映问题?有利益受损就会有诉求反映。

因为群众前来反映问题的多了,就雇佣大批保安以图拒之门外,不免有些缘木求鱼。不仅不可能真正消弭矛盾、化解危机,反倒会因为国土部门官员的刻意回避而积聚矛盾,终致不可收拾。有些问题,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捂不住也躲不了。如果一群保安都能妥善处理,那要国土部门何用?